

黄岩文史资料通讯

(请予传阅 核实指正)

第 六 期

黄岩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五年九月

目 录

王卓烈士传集编.....	王天眷 (1)
淞沪保卫战亲历记.....	徐展抱 (4)
罗宗洛教授史料.....	罗邦煦等 (6)
周炳琳教授史料.....	周北凡等 (14)
许康先生史料.....	许 湘等 (18)
应万德起义.....	管听石 (22)
回忆共新学社与求益学社.....	柯 瀛 (25)
九峰书院和它的藏书.....	尤伯翔 (27)
诗五首.....	朱劼成 (31)
黄岩农谚选.....	美溪辑 (35)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淞沪保卫战亲历记

徐展抱

民国廿六年（1937）春，余服役九十八师二九四旅五八七团第三三连排长任内，驻节汉口堤家矶营区整训。……

“八、一三”上海战事爆发，本师奉命由汉口登轮，十五日晨抵达南京下关，改乘火车开赴上海，沿途受到群众迎送，情绪激昂。夜抵达南翔站下车，进驻江湾沪江大学附近。十八夜，本团奉命攻击虹口正大纱厂，每班准备竹木梯一把、门板二块，以便通过敌外沟铁丝网之用。我们涉过十余条小河，进入攻击发起线。待军长罗卓英令下，即迅速前进。眼看正大纱厂灯火通明，探照灯不时向我方照射。未几，敌炮向我军猛轰，敌军出击，枪声四起，激战两小时，夜袭未成，奉命撤退。本师移防长江右岸，进驻宝山城狮子林炮台、新镇、月浦之线。当抵达江边堤防，只见江中有敌舰二十三艘。我们离村落一、二里构筑工事防守。

战发初期，战事限于上海市区附近之江湾、闸北一线。尔后，我方援军陆续抵达，序列为三战区。浦东为右翼军张发奎，上海西北及京沪线为朱绍良，长江右岸为左翼军陈诚等共三个集团军。敌军于宝山、新镇、罗店登陆后，罗店原为十四师防区，本团原守月浦前，为策应罗店守军，奉命出击。敌军炮兵即向我前进部队猛烈轰击，一路炮弹呼呼，待逼近敌阵时，敌炮弹出口即炸，加以沿途均为棉花田，河流纵横，部队运动困难，伤亡很大。右翼第一连不支，我连掩护撤退。我排退至后面村落，掩护本连撤退。沿途有不少小河，正涉水间，忽见林连长胸部中弹，倒地无法动弹，只好派一名弟兄留着照顾，报告团部派担架抬回，是役本连伤亡二十余人。时已黄昏，我们奉命退至河岸防守，在两村之间构筑工事，经一天劳累，我们隐蔽在大树下倒地欲睡，但尸体恶臭，无法入眠，夜已深亦无可奈何。次晨，只见四周尸体纵横，河沟中还有十多具，这些都是十四师战友，大概二三日部队在此集结被敌机炸射身亡。临行前由本连弟兄将尸体就地掩埋。上午即回月浦前线。

宝山城守军是五八三团第三营营长姚子青，该团团长孙景路亦在宝山前线，他们督率

部队坚守宝山城，激战数日，城终被破，守城官兵全部壮烈牺牲，此事当时震撼中外。接着狮子林炮台及新镇也先后失陷。本团第三营营长言震湘（军校六期）为旅预备队，奉旅长方靖之命，烧毁通往新镇的公路木桥，阻敌前进。言营长派七连执行命令，连长命排长，排长命班长前往烧桥。结果，桥只烧了一半，敌迅速修理，一辆装甲车竟直闯到我旅部大门前。言营长派七、八两连夹击敌后续部队，伤亡惨重。敌装甲车退回后，方旅长以言震湘贻误戎机，大为震怒，着团长侯思明将言捆绑，就地枪决。在月浦前线抵抗敌军进攻，伤亡过半，对外联系中断，每晚期待特务长董伙夫送饭来才能听到后方及友军消息。我们坚守阵地十余日，直到右翼被突破，放弃前线，退守月浦镇，本排守镇后的大土堆。此时全排仅留十二人，待进入阵地时，见已有掩体、散兵坑及交通壕，周围还有铁丝网。我带了班长巡视一周，指示晚间将哨兵调至下方铁丝网边，正面向着上坡。当时即闻远方敌舰排炮呼啸而来，主炮就落在大土堆上。我们卧倒。大小土块不断落在身上，枪声振耳欲聋，我抽动手下四肢，却未受伤。站在上面的哨兵，却手臂受伤。接着，又来四炮，落在同一地方，我们已进入掩体，虽未受伤，但余悸犹存。黄昏时，营部传令本连速至月浦街上向五八八团李营长报到。我说：全连已不到三十人。他说：一、二两连还没有我们多。到达街口，李营长带领我们进入竹林，并指明对面独立屋内有敌兵二、三十人，且有机枪。他们营已冲锋三次均未过铁丝网，要我们一起再冲。当时他们全营只有四、五十人了，但斗志仍很旺盛。我们每人加发一个手榴弹进入散兵壕。待冲锋号音一响，我们即冲向铁丝网，敌军用机枪猛烈扫射，我们有些已过网，有些负伤后倒在網上，有些还未过网伏地不动。此时天色已黑，经猛烈搏斗后，士气渐衰，我们的任务，本为了争取时间，让扬行、大场、蕴藻浜一带的第二线得以加强工事，现在任务告一段落，九月中，奉命转进。沿途见有许多负伤战友，呻吟不断，其状殊惨，我们只好加以抚慰，等待后送。到嘉定后，我连就奉命停留整补。

在整补期间，湖南保安四团补充我们有生力量，日间构筑工事，夜间进行训练。此时我已调团部通信连排长。有一夜，总司令陈诚、军长罗卓英集合本师官长训话，除嘉勉外，并说：激战月余，当面敌军番号仍不明，要我们再上前线时，活的捉不到，死的也要抬回一个。十月中，部队又上前线，协同牛行、刘行、顾家等友军作战。通信连不须直接参战，但离第二线亦不过三、五里，仍在敌炮兵及飞机炸射之下。其时敌气球常升空在我阵前侦察，并不时炸射，几乎每日都有伤员抬下。当日有两件事一直使我忘不了：有一天敌机来袭，周连长胸部中弹（他刚升为连长，是我的好战友），他躺在担架上已无力言语，神志

似尚清，从口袋摸出一封信，上有他妻子的通信地址，我已明白他的用意，是要我写信告知他的家属，此情此景，不禁恍然。另一件是本团第二连有个班长，在夜战中竟从阵前拖回一具敌军尸体，得知系敌第九师团的。这本是完成上级任务。这位班长即升为排长，师长并犒赏他百元。

淞沪全线抗敌，至十一月中，激战已近三个月，我方牺牲惨重，但斗志不衰，敌方虽仗海、陆、空优势武器，仍难攻占上海。后敌军绕道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切断我沪杭铁路，我方不得已全线大撤退。淞沪保卫战从此告一段落。我师退至常熟时，进入国防工事掩护大军后撤，次年到达无锡转宜兴，余后转入苏、浙、皖边区游击，其经过情况，另有叙述。

黄岩南乡十里铺人，现年七十七岁。徐宗洛教授曾考取国民党军校，毕业后曾参加抗日战争，后在青岛某粮站任中校一级军官，解放前夕随军去台湾。此文自《台北市浙江黄岩同乡会九周年特刊》中《抗战随笔》篇节录。黄岩南乡十里铺人，现年七十七岁。徐宗洛教授曾考取国民党军校，毕业后曾参加抗日战争，后在青岛某粮站任中校一级军官，解放前夕随军去台湾。此文自《台北市浙江黄岩同乡会九周年特刊》中《抗战随笔》篇节录。

罗宗洛教授史料

我们的父亲罗宗洛教授



罗邦煦 罗昌杰 罗邦照 罗邦二 罗邦三 罗邦四 罗邦五 罗邦六 罗邦七 罗邦八 罗邦九 罗邦十 罗邦十一 罗邦十二 罗邦十三 罗邦十四 罗邦十五 罗邦十六 罗邦十七 罗邦十八 罗邦十九 罗邦二十 罗邦二十一 罗邦二十二 罗邦二十三 罗邦二十四 罗邦二十五 罗邦二十六 罗邦二十七 罗邦二十八 罗邦二十九 罗邦三十 罗邦三十一 罗邦三十二 罗邦三十三 罗邦三十四 罗邦三十五 罗邦三十六 罗邦三十七 罗邦三十八 罗邦三十九 罗邦四十 罗邦四十一 罗邦四十二 罗邦四十三 罗邦四十四 罗邦四十五 罗邦四十六 罗邦四十七 罗邦四十八 罗邦四十九 罗邦五十 罗邦五十一 罗邦五十二 罗邦五十三 罗邦五十四 罗邦五十五 罗邦五十六 罗邦五十七 罗邦五十八 罗邦五十九 罗邦六十 罗邦六十一 罗邦六十二 罗邦六十三 罗邦六十四 罗邦六十五 罗邦六十六 罗邦六十七 罗邦六十八 罗邦六十九 罗邦七十 罗邦七十一 罗邦七十二 罗邦七十三 罗邦七十四 罗邦七十五 罗邦七十六 罗邦七十七 罗邦七十八 罗邦七十九 罗邦八十 罗邦八十一 罗邦八十二 罗邦八十三 罗邦八十四 罗邦八十五 罗邦八十六 罗邦八十七 罗邦八十八 罗邦八十九 罗邦九十 罗邦九十一 罗邦九十二 罗邦九十三 罗邦九十四 罗邦九十五 罗邦九十六 罗邦九十七 罗邦九十八 罗邦九十九 罗邦一百

我们的父亲罗宗洛教授于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1898年）8月出生在黄岩南乡十里铺。家道殷实，幼年丧母。他在十三岁时毅然冲破家庭的阻挠，离家到杭州就读，第二年转入上海南洋中学学习。1917年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在日本第一高等预科、仙台第二高等理科学习结业后，于1922年进入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的农业生物学植物学分科学习。1925年毕业后随老师

著名植物生理学家坂村彻教授，进行植物生理方面的研究，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至此，他在异国他乡，寒窗苦读，前后十三载度过了他的青春。十三年的勤学苦读，他不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且在日本名师的培养下也奠定了他一生的优良学风和为祖国科学事业奋斗的基础。这对祖国植物生理学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0年春，父亲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后，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任生物系教授。1944年起担任新建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1946年所址由重庆迁至上海，设备有了较大的改善，这就是现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前身。1948年曾应印度代理台湾大学校长之聘，赴台任台大校长。

解放以后，1950—52年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1953—78年一直担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1957年当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后又为日本植物学会名誉委员。1953年起先后任第一、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他坚持科研和教学工作达五十余年。涉及细胞生理、矿质营养、水分生理、抗性生理、辐射生理等领域。曾亲至苏北沿海造林，西北干旱地区和黄、淮流域盐渍化对植物生长影响的考察调查和研究，曾多次亲往华南（包括海南岛）从事橡胶树冷害等问题的调查考察。晚年则致力于植物细胞学的研究。他在学术上的造诣和成就以及他对科研人才的热心培养，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崇。他是我国植物生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他为我国植物生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父亲卒于1978年10月26日，享年八十一岁。逝世后，他的工作单位曾为他写了总结性的悼文，他的中外友人对他生前的为人处事，分别写过不少的具体回忆。对此，我们当深深表示感谢，这方面的事迹，恕不赘述。我们兄妹七人，现在大部分在做科技工作。我们父亲一生孜孜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子女学习，并不断鞭策我们前进。

罗宗洛先生，字子衡，浙江嘉兴人。早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后赴日本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教于浙江大学、中央大学、暨南大学等。194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长，1946年迁至上海。1948年应印度代理台湾大学校长之聘，赴台任台大校长。1950—52年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主任，1953—78年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第一届、第二届理事长。1957年当选为苏联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后又为日本植物学会名誉委员。1953年起先后任第一、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

编者注：本文根据罗宗洛教授子女的三篇来稿综合而成。罗邦熙现在中国科学院植物所任生物物理系任教，罗昌杰在厦门亚热带植物研究所工作，罗邦熙在金华制药厂工作。

罗宗洛教授的科研成果与治学精神

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

罗宗洛同志是我国植物生理学创始人之一。他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五十年，培养了一大批学生，有著作四十余篇。早年他在水绵细胞质的粘度变化与酸度的关系方面，在植物对硝态氮和铵态氮的吸收、利用方面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创见，并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指导作用，得到国内外科学家重视和好评。他在植物矿质营养生理方面做了较多的研究，论文曾在日、德、美、英各国刊物上发表，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声誉，一九五七年苏联农业科学院曾授予通讯院士。

他进行的植物离体根尖培养，是国内组织培养研究的倡导性工作，曾与童第周、贝时璋、朱洗等同志一起创办《中国实验生物学杂志》，提倡用实验方法来研究生物学，对我国的生物研究从分类、形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到实验阶段起了推动作用。

罗宗洛同志经常注意学科发展的新动向，鼓励同志们应用物理、化学的新成就从事植物生理学的研究。他重视对学生的培养，经常教育学生要尊重科学实验。一九五六年在全国人大和政协的联席会议上，罗宗洛同志提出了对培养科学人材的积极建议，受到陈毅副总理的重视。

罗宗洛同志在坚持理论研究的同时，十分注意联系实际的工作，他曾长途跋涉，不辞劳苦去苏北滨海地区调查抗盐植物和营造防风林的问题，去西北考察干旱区和盐渍土壤植物生长情况，去华南协助解决橡胶树的北移和冷害问题。在他的指导下，植物所内先后开展了抗性生理、辐射生物学、细胞杂交和核移植的研究。

罗宗洛同志治学谨严，工作认真负责。四十年代创办《植物学汇报》杂志，从编辑到校对，都由一人承担。在他主编《植物生理学报》时期，每一期，每一篇文章，他都要亲自看三、四遍。罗宗洛同志为人正直，团结同志，生活简朴。

“四害”横行时，罗宗洛同志面对残酷迫害，不畏强暴，坚持正义，表现了一个正直科学家应有的本色。他对破坏科研工作，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进行严肃的批判。当时他已年老体衰，行动不便，为了夺回“文革”失去的时间，他仍经常上图书馆查阅文献，参加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一九七七年三月，他抱病参加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全国科学大会，并向全

所同志作了传达，在会上，对植物生理研究所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罗宗洛同志在发病住院期间，仍然殷切关心全国植物生理学第二届年会的召开和所内工作的进展，不断对他直接领导的一部分科研人员做出具体指示，直到病情加重，他还计划着出院后看什么、做什么工作，而且多次表示愿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最后的精力。

编者注：本文自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办公室于1983年复黄岩县人民政府的材料中节录而成。原材料略历部分，本刊本期另有叙述，著作目录部分，因多系德、英、日等国文字的专著，此处姑从略。

罗宗洛博士嘉言懿行录

罗宗洛博士于1978年逝世后，国内外友人、学生纷纷为文悼念，兹分别选录有关罗博士生前之嘉言懿行于下，藉作后辈楷模。

本刊编者

日本·平冢直秀教授：

“当年在坂村先生门下学习植物生理学的，有比我早一年的先辈罗宗洛君。他在仙台二高毕业后，因慕名坂村先生而进入北海道大学。他是诚实、勤学的青年。他在坂村先生指导下，专攻植物生理学并取得了学位。”

日本·须藤酉教授：

“我是他留学日本时代的密友。他在学生时代，不论做什么实验，都泰然自若，不慌不忙，扎扎实实，操作准确。……时隔几十年，上次，罗先生访问日本时，旧友重逢，喜出望外。罗先生满面红光，非常健康。他没有间断的做研究工作，生气勃勃，不是我这样平庸之辈所能比拟的。”

日本·木原生物研究所木原均：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罗先生担任中国的台湾大学校长。罗校长对待日籍教授的这些不顺眼的研究人员，竟予以意想不到的宽大。为此，台湾大学在战后，也能成

为稳定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并且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日本植物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罗先生到东京出席大会……在餐厅里举行欢迎会。许多钦佩罗先生品德的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宽大的客厅显得拥挤不堪。……罗先生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而且是很重信义的人。特别是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时，给日本的研究工作者留下了德高望重的印象。”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施教耐：

“1947年我在贵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洛师为了营救我，费尽心血，四处托人并且不顾个人安危，以身家性命作保。听朋友说，当他得知我被捕时十分焦虑，心情非常不安，连手都发抖，求援的信不得不让身旁的学生代笔。解放后，我从贵州来到上海，见到他的时候，他只是微笑地说：‘你总算活着回来了’。关于他营救我的事，从未谈起，而我亦因不善于当面表达自己的感情，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亦未向他说起，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洛师秉性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真是铁骨铮铮！他在浙大任教期间，曾为理学院某些不良作风，毅然退回聘书以示抗议。他在中央大学亦因这类不平的事而愤然离开。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阶层腐败无能、特务横行更是痛恨万分……他对造成当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不得不为生活到处奔波，未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环境非常气愤；特别对这一些人的遗孤，战时滞留重庆，生活无着，贫病交加，更为愤慨。”

北京科学出版社黄宗甄：

“1948年冬天，杭州浙大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杀害，激起全国性的反抗运动。国民党当局竟株连到留贵州湄潭养病的一个同学，以莫须有的嫌疑逮捕了他。消息传到上海，洛师气得发抖。他亲自写信给国民党有关当局，声言以一生信誉与人格保证，要求释放这个学生。”……“洛师逢年过节每设家宴邀约学生们去聚会。这对从东南沿海和北国、中原流亡到贵州的学生来说，无疑是无上的慰藉。有一次除夕，他吟了一句陆游的‘南望王师又一年’。他说当今的政局与南宋系一丘之貉……。1942年2月浙大学生掀起‘倒孔’（反对孔祥熙）运动，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助教和学生，黑云压城，白色恐怖。当时他担任湄潭浙大教师会常务委员，开会时抗议国民党血腥镇压，怒斥暴行，慷慨陈词，大义凛然。”……“抗战期间，浙大生物系曾迁至贵州省遵义之东75公里的湄潭。……真是筚路蓝缕，当时的实验室是破旧的祠堂、土地庙或是茅棚葺起来的，一切还得自己动手。……肩挑湄江水盛满高台上的大木桶，权充自来水塔了。洛师就在这样艰苦而简陋的条件下整整度过四年。这四年也是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颇为出色的年代。”

“1962年，洛师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在陈毅同志再三鼓励并特别安排在周总理到会听

取发言时，让洛师登台发言。他站在总理面前，对基础理论在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对于教育工作中培养接班人，要择优选拔人才，不可仅重形式仅做表面文章的危害性；对某些大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不重视本人的才能与业务水平等问题，剖析精辟，并郑重呼吁，提请领导注意。当时会场上反应甚为强烈。”

“1972年，经过文革的磨折，劫后余生的老人步履维艰、两手发抖，但他仍争取时间从事写作。1973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编写的科普著作《植物生理知识》。在该书排印过程中，他来信说：‘书中引用了一位外国作者较多的新近资料，书的封面只能署罗宗洛编译，千万不可署为罗宗洛编著，这是写书的起码道德，必须办到，以正视听’。”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柳天綽：

“在教学中心洛师总是认真备课，并且随时补充新材料。在课堂上，他充分地利用每一分钟，从不谈半句多余的话。……把一年内讲不完的课程写成讲义，让我们系统而扎实地掌握植物生理学的全面知识。……洛师还领导我们每周进行一次书报讨论会，提高我们科学知识并有意识地引导我们酝酿毕业论文。”

“洛师平易近人，每借生徒把酒论古今中外，相与忘年。然谆谆教诲，仍不违严谨。尝引巴甫洛夫喻肥皂泡的故事为训。要求笃实，力屏浮夸。常诫士不患贫，而患无志。”

“抗日战争期间，先生在重庆北碚主持前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家中食指浩繁，生计清苦，暇日佐理家务，躬自浣洗衣服，一生俭朴，数十年如一日。”

“先生暮年多病，每稍痊，即策杖蹒跚，勉造书库，查考文献，笔记摘要。间作专题讲演，而壮志仍不衰。”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倪晋山：

“洛师家人口多，生活艰苦。记得有一年除夕，请我们一些远离家乡的流亡青年吃年夜饭。洛师读了几段巴甫洛夫院士给苏联共青团和年轻科学工作者的信，其中有‘不要大胆的猜想和假设来掩饰知识的不足，不要为骄傲所纠缠，不然，将失去有益的忠告、友谊的帮助和客观的标准’”。

衣口裁三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夏镇澳：

“1944年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罗宗洛教授主讲微量元素生长素及秋水仙碱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罗老的学术报告深入浅出，条理清晰，严肃认真，又很风趣，很快吸引住我们，包括那些调皮潇洒的‘顽童’”。

“罗老的一生，心胸坦荡，磊落光明，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一心为祖国建设出力，

探索植物生理学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他亲自带队去苏北盐碱地考察调查,开展抗性生理。又多次奔赴大西北和华南考察。”

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顾瑞琦:

“罗老常讲起学生的情况,他说从前板村老师看到学生白天在实验室中看书(除了实验方法的书外)就要批评说:‘你们回家后都去睡大觉的么?’就是说在实验室以做实验为主,看书应在家里进行。罗老又常说:做研究工作不是八小时的问题,而是要全力以赴。罗老还再三强调,一定要做好实验记录,极其重视实验的原始纪录。”

华南师院生物系潘瑞炽:

“我在贵州湄潭浙江大学读书,在一间由破庙改建的课堂里,洛师给我讲植物生理学。他足踏布鞋,身穿褪了色的旧布长衫,手拿一些卡片,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滔滔不绝地讲课。他讲课内容丰富,条理清晰,生动易懂。他不只叙述已经确定的知识,而且提出仍未解决的问题。”

“1972年我在上海看到他,他年老多病,但是每天还坚持到图书馆看文献,一坐就是三、四小时,天天如此。他把当时写的卡片和综述给我看,字体端端正正,文章流畅,把当时国际有关细胞培养、细胞融合的新动态及时总结出来,以指导研究工作的开展。他有那么丰富渊博的学问,还要活到老学到老,这种精神,对我教育很大。”

编者注:

以上各节是从《植物生理学通讯》1981年特载栏及罗昌杰同志保存的悼念文章中辑选的。

罗宗洛青少年时代二三事

罗三妹口述

罗宗洛一八九八年出生在黄岩十里铺一个殷实人家,父亲名叫罗文甫,先后共娶过三房妻子。宗洛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的生母亡故时,宗洛才六岁,妹妹三岁(即口述人罗三妹)。奶奶和继母重男轻女,待他很不错,专门请来缪宏仁先生教读。宗洛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尽管隔壁就是戏棚,夜里做古装大戏很热闹,六岁的宗洛却从不去瞧,整天关在

书房里用功，因而姐妹们常叫他“书腐”，渐渐，整个十里铺都知道罗家出了个“书腐”了。

一九一〇年，罗宗洛偶然翻到一张报纸，看到了杭州某中学的招生通告，他尽管只有十三岁，但被新式学校各种新学科所吸引，萌发了要出门求学的念头。父亲虽然读过几年书，平生只知创业守成，一听儿子要去杭州进什么“洋学堂”，自然不准许。罗宗洛又哭又闹，搞得全家不得安宁。奶奶和继母安慰他：“洛儿，我们家里又不缺吃少穿，你要想读洋书，叫你父亲请大学生来教你好了，何必一定要去杭州？你年纪这样小，去外面读书，断眼无亲人要吃苦头的。”姐妹们劝他：“兄弟，你这是何苦呢？在家享福不好么！爹又没缺你吃的，没缺你穿的，何必一定要进什么洋学堂呢！到杭州读书是要剪掉辫子的，人没有辫子，那多难看啊！”但罗宗洛决心已下，任谁也劝他不住，他瞒着家里人把辫子割了。父亲气得不得了，将宗洛关在楼上书房里，饿了一天一夜。姐妹们瞒着父亲给他送来吃的，他也不吃，并表示，不让他去杭州读书，索性饿死算了。姐妹们见宗洛的决心下定了，只好再三请求父亲，说我们这样逼他，万一逼出什么事来，怎么得了？让他去读书，读了几年反正会回来的。父亲终于同意了，为他准备行装，托黄岩城内表伯同他一起去，路上好有个照应。

宗洛出门求学，一晃十多年未归家。他先在杭州读了一年书，后至上海南洋中学读书，南洋中学毕业后即到日本留学，此时他父亲在家乡为他订了婚。罗宗洛十几年不回家，他父亲听到了不少闲言碎语，说儿子二十好几了，没人肯嫁他，儿子连家都不想回了，说罗老大苦死苦活，临死时不知谁给他送终。父亲又气又恨，恨独养儿子不争气，忘恩负义，也许真的成了“书腐”，自己要断“香烟”了。经过再三思衡，决定瞒着在日本求学的儿子，替他定了媳妇再讲。宗洛于一九二五年返国归家完婚，那年，他已28岁了。尽管他的婚姻是包办的，但婚后，夫妻的感情一直很好，妻子也能理解丈夫，在生活上总是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他。他们有七个子女，也都受到很好的教养。

（黄美溪整理）

编者：罗三妹是罗宗洛教授的妹妹，年已85岁，住本县屿头乡双溪口，尚健在。

周炳琳教授史料

我的父亲枚荪公

周北凡



周炳琳教授

我的父亲周炳琳，字枚荪，黄岩上山周人（现属头陀区上垟乡前岸村上山周）。

父亲少年时曾就读于黄岩清献中学，后到南京商业学校学习，继又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五四”运动时是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参加了当时积极传播新思想的“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就在此时，他结识了李大钊同志。对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用人主张“兼收并蓄”十分拥护。父亲在1920年北大经济系毕业，接受穆藕初奖学金赴欧美留学。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后去法国、英国攻读经济学，回国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国民党，

先后在广州、浙江等地工作，1929年起应聘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1931年转北大任经济系教授，继任北大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大经济系教授。父亲一生除短期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教育界工作的。抗日战争时期，他远离家庭（当时家在重庆）只身在昆明艰苦维持西南联大的局面，为国家培养人才不遗余力。抗战后期，他患严重的眼疾，几致失明，但仍坚持在昆明。抗战胜利后，北大迁回北平（北京），他仍主持法学院工作，聘请了一批留学归国的中青年法律、政治、经济学家，使北大法学院阵容一新。有些至今仍是北大法律、经济等系的中坚教授，如国际法专家王铁崖、法律学家芮沐、经济学家陈振汉等。

父亲一生从事教育事业，为人正直不阿，不趋炎附势。抗战后期，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日益不满，曾多次在国民参政会上直言抨击，但他当时还存在着第三条路的幻想。1946年7月留渝民盟负责人史良等组织民主领袖李公朴、闻一多的追悼大会，父亲不顾特务的

1922年至24年离美赴西欧，游学英、法、德诸国。

（三）1924年至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4年回国后，应北大聘，经李大钊介绍参加国民党。

北伐前曾在上海民国日报馆任编辑并撰写社论。不久去广州。嗣后随国民政府至武汉，宁汉合流后又到上海。

（四）1927年至1937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初在杭州任国民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从事建党事宜，后因拟候选人名单忤主委张静江（张系湖州人，左袒二陈）而辞职。

应罗家伦聘，就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旋应蒋梦麟聘，返北大任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此后一直以北大教授为本职）。

1935年左右，一度任河北省（省会在天津）教育厅长。在任时，拒绝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借口睦邻亲善，妄想借手取缔学生抗日活动的要求，从而遭日特劫持。但先生大义凛然，始终不屈。又在离任移交时，严以律己，拒取不义之财，以实际行动反对官场中陋规积习。

离天津后赴南京，任国民政府教育部常务次长（时部长为王世杰）。

（五）1937年至1939年（抗战初期在武汉、重庆时期）

教育部长易人（陈立夫继任），先生改任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受命平息该校学生罢课事件，经过反复斡旋，终于在短期内完成使命。

1938年国民党参政会成立，先生受聘为参政员。在王世杰任秘书长时，先生为副秘书长（邵力子任秘书长时，雷震为副秘书长）。

1939年辞去中政校教务长后返北大（当时昆明）仍任法学院院长，并参与西南联大的教学工作。

（六）1939年至1946年夏（在昆明时期）

先生在联大时讲授《经济理论》、《欧洲经济史》等课程。当原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陈序经离校后，由先生兼任西南联大法学院院长。

常应邀在学生社团主持的集会，或学校召开的全体学生大会作公开讲演，其内容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持批判态度，多数听众认为先生的主要观点是公允的，因此很受欢迎。

在全校教授会议上，能以兼容并蓄的胸襟倾听各方意见，并求同存异，提出多数人乐于接受的议案。故历次教授会通过的决议，恒以先生之意见为主导。